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Finally, they labour everywhere
for the union and agreement
of the democratic societies
of all countries.
The Communist Par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end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
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
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屑于
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

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

资产阶级统治，达到

消灭阶级

的目的。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

全世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

一切，都

要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武国友 丁雪梅◎著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三卷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郑 谦◎主编



武国友 丁雪梅◎著

中国共产党 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三卷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 第3卷 / 郑谦主编; 武国友, 丁雪梅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06-8532-4

I. ①中… II. ①郑… ②武… ③丁…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指导思想—思想史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6672号

总 策 划: 王桂科
执行策划: 何祖敏 应中伟
策划编辑: 邓祥俊
责任编辑: 邓祥俊 黎 雷
责任技编: 吴伟腾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南朗大车工业区东恒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2.75印张 450 000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8532-4

定价: 43.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21848

导言

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创新与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转折。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重新奋起，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创新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阶段（1978—1982）。在这一阶段，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初步启动，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沿海开始创办经济特区。与改革开放相适应，在政治思想领域，开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历史转折关头的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后，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思想。这四年正如邓小平所说，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第二，从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前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1982—1992）。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这一阶段，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各个领域逐步展开，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强治理整顿，加快上海浦东和海南开发。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党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局势剧变的严峻考验，实现新老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这十年的改革，前五年的态势，可谓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向各领域逐步展开，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后五年的态势，着重进行治理整顿、协调内外关系、处理各项矛盾，为经济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在这一阶段，总的态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渐趋明确。

第三，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世纪之交为“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面临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了历史航向，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因此，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两个前后相连的重大事件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党的十四大初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纲领后，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加快步伐。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改革开放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任务。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任务提前完成，城乡居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水平。这一阶段的改革，总体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鲜明、针对性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改革的主要对象是缺乏活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点着力于改革缺乏自我发展动力与面向市场活力的微观主体，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

轨。

第四，进入新世纪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2001—2008）。这是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经党的十六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重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这一阶段的改革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全面完善”、“又好又快”、“统筹和谐”、“四位一体”，总的趋向是逐步走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三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历史中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曲折和挫折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从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创新视角来看，其最大成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从实践层面而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层面而言，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创新将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愈益发展；“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会更加不断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从而继续向前发展。

目录

导 言 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创新与改革开放新时期	1
第一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酝酿和正确路线的恢复与重新确立	1
一、徘徊前进中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	1
二、理论认识和思想阻力的破解	8
三、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局部酝酿	26
四、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第二章 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调整新形势下的社会关系	39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	39
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50
三、合理调整新形势下的社会关系	67
四、恢复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72
第三章 加强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与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83
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与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83
二、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95
三、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99
第四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10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109



二、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21
三、明确时代主题和发展对外关系	128
四、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开启和平统一进程	145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154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154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	167
三、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进一步明确	174
四、走以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181
第六章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	194
一、治理整顿的全面展开和一系列“两手抓”方针的提出	194
二、“八九”政治风波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209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	211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	223
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和行动纲领的制定	223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229
三、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232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形成	237
第八章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41
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41
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247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	249
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252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59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	259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263
三、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69
四、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	274

五、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279

第十章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288

一、进一步明确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 288

二、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 297

三、加强党风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299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303

第十一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310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与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纲领 310

二、深化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321

三、推动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327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331

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建立和谐世界 334

第十二章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3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338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与“四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 340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新部署 346

四、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51

后记 356

第一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酝酿和 正确路线的恢复与重新确立

一、徘徊前进中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

在1976年至1978年这个过渡阶段，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主要是通过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恢复高考制度、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事件得以实现的。

1. 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支撑“文革”的政治势力从中央的最高层被打倒，但关系到“文革”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此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

在毛泽东临终前受命，随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依靠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以他所处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举杯同庆。

粉碎“四人帮”之初，华国锋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党内外的拥护。全国陆续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着手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这时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面开展揭批“四人帮”，一面又极力限制对“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进行清算，特别是不允许触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就使平反“文革”



中冤假错案的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受到阻碍。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1月18日，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坚持毛主席讲过的、指示过的，不会错。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想维护包括“文化大革命”错误在内的毛泽东的“旗帜”，但它却是与形势的发展相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鉴于党内外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陈云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四点意见，并完全拥护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王震的发言也提出相同的意见，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叶剑英、李先念两位中央副主席也明确赞成。在这种形势下，华国锋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职务。

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被“四人帮”镇压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即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就应该平反。然而，那些与邓小平“同难”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处境，却仍然晦暗不明。于是民间自发地兴起为天安门事件正名的运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16名教师（署名“童怀周”）自发搜集并以油印方式传播“天安门诗抄”，人们争相购买，翻印传播，造成很大社会影响；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作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揭穿“四人帮”及其爪牙的丑恶嘴脸。该剧相继在上海、北京上演引起轰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北京青年工人韩志雄在“四五”运动中的事迹（很快被汪东兴严厉批评、该杂志被收回）等。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后来得到正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正义力量自下而上不懈努力和执著争取的结果。

直至1978年11月14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并在15日的《北京日报》上公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

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可是，这样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仅由地方报纸公布平反决定，显然是不够的。

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敏锐地注意到这篇报道，从全文中抽出这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一下就把这条消息的意义提高了。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事后，连胡耀邦也对胡绩伟说：“这样重要的事情也没给我打招呼？”而曾涛等人当时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大家都赞赏曾涛的勇气和果断。

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由华国锋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至此，“天安门事件”最终得到了平反。

2. 开始局部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牵涉全国范围党内外相当大的社会人群冤屈得不到伸张，基本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粉碎“四人帮”后，全社会最直接、最急迫的诉求是尽快平反冤假错案。这成为包括遭受过严重迫害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社会阶层热切的企盼和强烈渴求。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透露出明显的政治理性价值。8月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指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这些重要信息，为进一步提出澄清历史是非问题打开了缺口。在没有得到解脱的人们心中，关乎自己或者关乎家庭、亲属命运和前途的希望之光开始点燃，并且愈燃愈旺。

胡耀邦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任常务副校长，他一直都在苦思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在胡耀邦支持下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至今有的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



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强加给许多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和所作出的错误结论。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中央有关部门在一个多月内就收到一万多份干部和群众的来信，都表示赞同文章的观点和所提出的措施。

《人民日报》还就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继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并摘登部分群众来信，报道一些地方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这进一步促发了人们洗雪不白之冤的情绪，纷纷通过上访和申诉信等形式，争取问题尽早获得解决。

然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仍受到很大阻力。一方面，在中央和一些地区、单位的组织部门，还有“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或受其影响的人，总是寻找种种借口推来拖去，不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担心处理审查干部中的遗留问题，特别是纠正那些错案，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典型的例子是，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央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结果被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挡在了门外，甚至连中组部的招待所也不让他住。像舒同这样被“挂起来”、“靠边站”的干部，仅中央和国家机关就有六千多人，这些人不断地上访，但都求助无门。

这件事对胡耀邦的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他推动落实干部政策的决心。“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借用但丁《神曲》中的诗句，胡耀邦说：“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①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胡耀邦还分析道：看来要确实解决干部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他再次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写了第二篇檄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谴责了类似于顽固坚持错误组织路线的行为。

这时，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认为，必须加强对组织部门

^① 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的领导，有些组织部门必须调整和充实力量，并大力举荐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是1977年12月15日到中央组织部上任的。那天上午8点，中组部前院内群情振奋，鞭炮齐鸣，全体干部职工满怀真诚信任欢迎新部长的到来。这个热烈场面，折射出广大干部群众希望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愿望。此后，中组部信访数量与日俱增。1978年1月份，每天上访的人数多达几百人，申诉来信多达六麻袋。有的来信还直接写上胡耀邦的名字。

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胡耀邦这位14岁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小鬼”，以无私无畏的胆略，冲破“两个凡是”设置的种种限制和禁忌，大刀阔斧地组织领导了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系列紧迫工作。

在来中央组织部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就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重大案件，就有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案件、陶铸案件、王任重案件、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等等，这究竟涉及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冤假错案，甚至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冤案，这叫“积案如山”，而中组部当前的处境则是“步履艰难”。

胡耀邦明确表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是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因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还是受战争环境影响而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我们也应该彻底解决。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他还向在场的人打招呼：以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据统计，中央组织部当时接收的案件有1730卷391 363件，被审查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占被复查人数的47.8%。在这些入当中，副部长级干部213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副总理7



人。^①

1978年3月至4月间，胡耀邦组织和指导中组部分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疑难案件的座谈会。他亲自到会参加讨论或讲话，对上百个久拖难决的疑难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划分政策界限，并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1）没有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2）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3）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4）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组部为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发出了四十多个指导性文件，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组工通讯》上刊出了三十多期近十万字的政策评论。在中央组织部的时间里，胡耀邦几乎每天都忙于处理各类来信，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一天处理了200封来信。据中组部一位干部回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有902封。经过胡耀邦和中组部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和细致工作，有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的问题获得了解决，并妥善进行了工作安置和生活安置。

正如胡耀邦所言：“冤案一理，人心大喜。”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有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起到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带头作用。到8月份，在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而被撤职的有9人，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央还对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3个部委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对于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揭批查斗争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②

3. 恢复高考制度给青年学子以平等发展的机会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格外醒目的标题“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恢复高考是新的历史时期中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拨乱反正》（中央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② 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

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发端，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前奏。这年年底，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高考。他们带着在基层劳动多年的知识积累，大都只经过短促匆忙的复习准备，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以农村插队、工厂学徒、部队复员以及在家待业等各种身份，潮水般涌向在各地仓促设立的考场，义无反顾地参加和见证了改变时代、改变一代青年命运的“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高考。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考生的年龄跨度史无前例，最大者37岁，最小者13岁。而当年录取人数只有27.2万余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正值岁末年关，有很多人由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机会。好在1977年只是部分恢复高考。从1978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高校正规招生中断了十年，全国具有报名资格的青年、学生达三千余万。而高校经历了“文革”的破坏刚刚在恢复，校舍师资条件有限，无法接纳众多的学生就读。1978年教育部相继决定恢复和增设60所重点高校，55所普通高校，并要求各高校千方百计扩大招生。结果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其空前的盛况至今回忆起来还有很多人唏嘘不已。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11年的人才潮一朝喷涌。有67万余人幸运地步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更有1100余万青年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这又牵扯到无数个家庭、单位及社会各界的思虑和关注，带来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

由于废除了“文革”中以权力和出身为核心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模式，按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将招生面扩大到11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很多过去根本不敢想象有任何机会的人，“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期间“白卷英雄”的现象一去不复返。恢复高考激励了一



代青年人学习的热情，开始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

由于1977年尚未进行全面拨乱反正，有不少考生因家庭问题影响未能被录取。但考生和家长们不再沉默放弃，而是奔走申诉，据理力争，使一部分问题得到解决。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批评了对考生的政审不是主要看考生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随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高考招生工作片面强调所谓“阶级路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整个社会层面看，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和社会解的氛围正在开始形成。这个变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高度紧张的政治关系正在逐渐化解。不仅是全面恢复高考，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讲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的重要观点，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此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到来了，包括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极大鼓舞。人们普遍感受到，有一种久违了的凝聚社会和人心的“和解”气氛，正在加速正常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二、理论认识和思想阻力的破解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不仅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在思想理论方面也造成极大混乱。随着1977年开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在经济理论上的谬论，开始逐步澄清“文革”中散布的种种错误思想，逐步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关于检验真理的正确标准，正确发挥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 经济理论界关于商品、流通和按劳分配等问题的大讨论

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商品经济在中国始终处在尴尬的地位。多年来，商品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农村集市上最简单的商品交换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